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

BEIJING SHIFAN DAXUE SHIXUE WENKU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 经济形态的多重考察

李志英 著



商務印書館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 形态的多重考察

李志英 著

育德中書館

2008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多重考察 / 李志英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
ISBN 978 - 7 - 100 - 05665 - 6

I. 近… II. 李… III. 资本主义经济—研究—中国—近代 IV. F1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 第 16533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JÍNDÀI ZHōNGGUÓ ZIBÉNZHÜYÌ JīNGJÌ XÍNGTÀI DE DUōCHóng Kǎochá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多重考察

李志英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5665 - 6

2008年7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0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9 1/4

定价：20.00 元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编辑委员会

顾 问：何兹全 龚书铎 刘家和

主 任：郑师渠 晁福林

副主任：杨共乐 李 帆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卫东 王开玺 王东平 宁 欣 汝企和

李梅田 张 翰 张建华 侯树栋 耿向东

郭家宏 梅雪芹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总序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是中国高校最早形成的系科之一，由1902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第二类”分科演变而来。1912年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1928年单独设系。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与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合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师资力量与综合实力，由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百年的演进历程中，一批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如李大钊、钱玄同、邓之诚、朱希祖、王桐龄、张星烺、楚图南、陈垣、侯外庐、白寿彝、柴德赓、赵光贤等，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辛勤耕耘。经几代人的努力开拓，北师大历史学系学术积累丰厚，学风严谨，久已形成了自身的劣势与特色。

如今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是我国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重镇，学科门类大体齐备，师资力量较为雄厚，既有国内外知名的老教授何兹全、龚书铎、刘家和等，又有一批崭露才华并在国内外史学界颇具影响的中青年学者，综合实力居全国高校历史学科前列。在教学方面，我系的课程改革、教材编纂、教书育人，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曾荣获国家教学改革重大成果一等奖。在科学研究方面，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由白寿彝教授任总主编、我系众多教师参与编写的多卷本《中国通史》，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

史学的压轴之作”。其他教师的学术论著也多次荣膺国内外各类学术奖项，得到学界好评。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业已铸就自己的辉煌，但学术的发展无止境。今天，中国社会政通人和，学术研究也日新月异，我们又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为了更好地传承先辈学者的治学精神，光大其传统，进一步推动学科与学术的发展，本系决定编辑《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陆续出版我系学者的学术论著，以集中展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整体学术水准。同时，相信这也将有助于推动我国历史学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向以奖掖学术、传播文化著称，此次《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的编辑出版，也承蒙其大力支持。在此，谨致由衷谢忱！

— 洋务企业资本形态 —

— 洋务企业的管理与资金筹措 —

目 录

11	…… …… ……	第一章
28	…… …… ……	第二章
38	…… …… ……	第三章
38	…… …… ……	第四章
39	…… …… ……	第五章
40	…… …… ……	第六章
40	…… …… ……	第七章
40	…… …… ……	第八章

**第一篇 早期资本主义形态——
洋务企业的管理与资金筹措**

第一章	洋务派与官办洋务企业的决策	3
一	并非企业家——洋务企业经营者的素质	4
二	官办洋务企业的决策——严重的官僚化倾向	18
三	企业决策中新因素的萌生	30
第二章	从粤筹三厂迁鄂看派系之争对洋务企业 发展的影响	34
一	张之洞的崛起与清统治阶级政治力量格局的变化	34
二	粤筹三厂迁鄂过程中的派系争斗	37
三	派系纷争给迁鄂三厂带来的恶劣影响	43
第三章	从唐廷枢看买办在官督商办洋务企业的 经营管理中的作用	48
一	唐廷枢与轮船招商局的筹办	48
二	唐廷枢与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的资金筹措	52
三	唐廷枢的新式管理理念和管理手段	66
四	余论——买办的转变	71

第二篇 私人资本主义形态—— 起源与发展

第一章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酿酒业发展历程考察	77
一	开埠后中国传统酿酒业的发展	78
二	近代以来传统酿酒业发展原因探析	85
三	关于传统酿酒业发展水平的经济学分析	88
四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传统酿酒业的衰落	92
附录	口述史——八路军的烧房	94
第二章	黄金时期的资本主义商业和金融业	100
一	商业的发展——数量的增长和方式的现代转型	100
二	金融业的发展——新式银行和旧式钱庄的 共同繁荣	111
三	“民十信交风潮”——繁荣背后的危机	117
第三章	近代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精神支柱——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产业革命精神	123
一	近代中国有无产业革命	124
二	近代中国的产业革命精神辨析	126

第三篇 中国土地上的外国资本主义经济 势力——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双重考察

第一章	外国在华资本主义经济势力与中国工业 发展的资金瓶颈	133
一	中国国内储蓄的流失——原因何在	133
二	近代中国的国外资本——来自何方	139

三	国外资本的效果和作用分析.....	145
第二章	近代中国股份公司制度的西源探究.....	154
一	西方公司制度的起源及其发展.....	155
二	私人公司——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公司形态.....	166
三	鸦片战争后代理行的衰落与寻求新发展的努力.....	176
四	外商在华商中的募股活动和股份公司的出现.....	184
五	旗昌轮船公司性质辨析.....	195
六	外商在华股份公司的制度变异.....	206

外一篇 《光绪朝东华录》研究—— 管窥经济转型条件下知识分子观念之变化

一	史料来源——探询与考辨.....	217
二	编纂思想——字里行间的捕捉.....	242
三	编纂特点——亦新亦旧.....	249
四	《光绪朝东华录》的史料价值.....	254
五	《光绪朝东华录》的问题及缺陷.....	271
参考书目	288
后记	300

第一篇 早期资本主义 形态——洋务企业的 管理与资金筹措

中国土地上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形态，如果撇开外国人依靠暴力携来的西式企业，最早应追溯自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企业。对于洋务企业的性质，学术界尚存在不同认识，这主要是洋务企业的幼稚性和不完整性带来的多面性造成的。无论强调哪一方面，都会从史料中找到足够的证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然而，将洋务企业归入中国资本主义的早期形态似乎不会存在太多的疑问，正是其幼稚性和过多的传统成分和风貌，决定了其作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前驱的地位。

第一章 洋务派与官办洋务企业的决策

第一节 洋务派与官办洋务企业的决策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近代化浪潮，它的出现催生了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社会的近代转型，首先是从经济开始的，经济形态的变化为政治、文化的转型累积了其赖以发生的最基础的条件。因此，这种经济的转型应当是自发的、从低级向高级渐进的，这样它才能在缓慢的渐进中悄然为依附于它的躯体之上的政治、文化不断提供实现转变的营养，政治、文化等次生因素也才能充分展示其能动性，反作用于经济，为经济的进一步更新提供动力。

然而，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并非完全发自自身的内在动力，它在西方坚船利炮打击的惨败后痛苦地转身向西看，不得已而开始了笨拙地向西方学习的过程。由于打击对感官的强烈刺激，带来了统治阶级对自身统治的强烈关怀。所以，这种向西方学习的动力牵引首先来自政治的层面，来自统治集团内部。此时，作为社会结构基础的经济结构刚刚开始变化，还没有为政治、文化的转化准备好条件。相反，来自政治层面的动力成为经济松动的撬棍。这种扭曲的社会转型的步伐，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转型中的不适，上演了一幕幕历史悲喜剧。

派——这些转变中的地主阶级的高官,担当了为中国经济的近代化经营第一批企业的重任。

必须承认,洋务企业经营效果普遍很差,特别是官办洋务企业,较之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更加集中地体现了洋务企业固有的弊病,更加集中地体现了洋务企业效率低下、效益不良的一面。为什么官办洋务企业的经营如此糟糕?效益如此不好?如果仅从经营管理的角度考虑,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决策者的素质不能适应新式企业经营的需要是重要原因之一。

作为官办洋务企业的决策者,洋务派是怎样一批人?他们通体散发的是怎样一种素质?

可以肯定地说,洋务派是中国地主阶级的一部分。当历史的车轮驶入19世纪中期,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顶峰,也已经走到了后期,作为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在缺乏新鲜经济和文化基因交流的情况下,中国的地主阶级已经显得暮气沉沉。但是,作为这个阶级的一部分,洋务派虽然在整体上仍未脱离地主阶级的窠臼,他们却是属于地主阶级中锐气还没有退尽的那一部分,属于将向新的方向转化的部分,因而独具特色。

洋务派不同于只知捞钱肥己、不顾社稷江山的贪官污吏,也不同于抱残守缺、不事更张的昏官庸吏,他们能量较大,是地主阶级中还有生气的部分。对于鸦片战争后的中外形势与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他们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出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械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

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①这是李鸿章的一段名言，其语言之精致、眼光之敏锐，极其典型地反映了洋务派官员对中外大势的看法。

“自古边塞之防，所备不过一隅，所患不过一国。今则西人于数万里重洋之外，飙至中华，联翩而通商者不下数十国，其轮船之捷，火器之精，为亘古所未有，恃其诈力，要挟多端。违一言而瑕衅迭生，牵一发而全神俱动，智勇有时而并困，刚柔有时而两穷。彼又设馆京师，分驻要口，广传西教，引诱愚民，此固天地适然之气运，亦开辟以来之变局也。”^②这是依附于洋务派的知识分子、并非高官的薛福成的一段话，其见识与李鸿章并无二致。可以说，洋务派内部从上到下几乎都认识到，他们所处的局面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局面，面对的敌人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敌，他们的认识远比同在一朝共事的其他官绅要清醒得多。

洋务派不像地主阶级顽固派那样愚昧自大、顽固守旧。他们是地主阶级中较善学习、较能接受新事物的部分，虽然有时是被迫的，是不那么心甘情愿的。1866年左宗棠在回顾以往时说：“臣自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载记官私各书，有关海国故事者，每涉猎及之，粗悉梗概。”^③1874年，李鸿章追溯过去的思想转变历程时也说：“臣虽愚陋，从事军中十余年，向不敢畏缩，自甘贻忧君父。惟洋务涉历颇久，闻见稍广，于彼

^①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光绪乙巳版。

^② 薛福成：“应诏陈言”，《庸盦全集》文编卷一，光绪丁亥版。

^③ 左宗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二，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64页。

已长短相形之处，知之较深。”^①以上两段表白，大概可以代表洋务派注重及时学习，通过不断学习能够对西方的情况、中外大势及西方的近代科技有较多了解的状况。因此他们才能够自诩“学识深醇，留心西人秘巧”，“机器详情，洞如观火”。这洋务派的这些话，不免有拔高的成分，但他们的确是地主阶级中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有较多了解的部分。

那么，洋务派是否因此就可以成为近代意义上的企业家了呢？否！他们依然是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世纪末的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他们通身上下散发的依然是封建官僚的气息，本质上他们依然是地主阶级的官僚，与近代企业家的气质相比，还存在着很大差距。

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作为近代意义上的企业家，一般应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典型特征：其一，具有强烈的进取心和冒险精神，或曰创新精神。他们并不安于现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或者企业经营业绩，常怀有强烈的创造欲。在思考企业经营对策时常常能够异想天开，别出心裁，作出出人预料的决策。他们决策的出发点首先不是在常规范围内的选择，而是对现状的挑战，力求创新开拓，在新的条件下获得企业发展的生机。

应当说，洋务派也是不乏冒险精神的，而且常常表现出相当强烈的冒险冲动。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洋务派认为墨守成规已经无法挽救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李鸿章说：“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

^①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

轻视。练兵、制器、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①洋务派的干将刘铭传和丁宝桢也不无忧虑地说：“今中国战不如人，器不如人，不思改图，后将奚立？”^②“今强敌各擅长计，中国独不屑蹈袭，以为墨守故常，不难角胜，且以为可以购求于外洋，此实自欺欺人之语，固必不可得之势也。”^③他们认为，中国古已有之的统治术已不足以应付已经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形势，固守已有的一套无异于置己于绝地。他们借用《易经》中的“穷则变，变则通”来为自己的主张寻找理论根据，他们认为必须打破千百年来的成规旧习，寻求解救地主阶级统治危机的新方法。

然而，打破常规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然要受到巨大的历史惰性的阻拦。洋务派办洋务，常常遭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在顽固派看来，改变祖宗成法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是中华文明的斯文扫地，是可忍，孰不可忍！激愤之际，每每群起而攻之。顽固派还拥有十分深厚的社会基础，往往能够造成朝野上下遥相呼应的宏大场面，形成十分强大的声势，给洋务派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和行为压力。

对于来自顽固派的巨大阻力，对于他们的行为需要付诸的风险，洋务派的内心十分清楚，“至非常之举，谤议易生，始则忧其无成，续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皆意中必有之事。”^④对此，洋务派表现了敢于应对的极大的无畏气概。在请求举办福建船政局的

^①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

^② 刘铭传：“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刘壮肃公奏议》卷二，光绪三十二年版。

^③ 丁宝桢：“覆陈机器局暂缓开办折”，《丁文诚公遗集》奏稿三，光绪十九年版。

^④ 左宗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集》奏稿卷十八。